

杜文玉◎主编

唐史论丛

第十二辑

三秦出版社

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第二次会议暨唐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集

唐史论丛

第十二辑

杜文玉 主编

三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
中国唐史学会 主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史论丛(第十二辑)/杜文玉主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80736-751-2

I.唐... II.杜... III.史评—中国—唐代—丛刊
IV. K242.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8807号

唐史论丛(第十二辑)

杜文玉 主编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空军西安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480千字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36-751-2
定 价 50.00元

网 址 WWW.sqcbs.com

Contents

The Celebration Ritual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Japan) Jinzi Xiuyi Xiaoze Yongsi / 1	1
Textual Research on Getting Married System of all Princes and Princesses in the Tang Dynasty Xie Yuanlu / 29	29
Confucian Mourning System on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Zhao Lan / 40	40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of Jimi Prefectures in the Tang Dynasty Fan Wenli / 48	48
Comments on the Coll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Tang Statutes on Mourning and Burial —— A Response to Ms. Inada Natsuko Wu Liyu / 66	66
Discusses about Cishi' s Status in the Late of Tang Dynasty Zhang Weidong / 79	79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 and Officials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Reflected by Wei Junjing' s Monument Tang Zhigong / 100	100
“Appeasement” and “Resort to Arms” ——the Establishment of Tang Dynasty Military Governor Polic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Meng Yanhong / 115	115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under the rule of Hebei Military Governor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Feng Jinzhong / 146	146
Reexamining An Pu' s Tomb Tablet: Focus on A Hu family which was from the Central Asia Li Hongbin / 160	160
Shiwei Tomb and Forest Steppe Zone in the Tang Dynasty——Take the Analysis of “the Corner Bow” as center (Japan) UCHIDA Hiromi / 182	182
The Situation of the east Turk Chu Luo Khan and Jie Li Khan Families into the Tang Dyna- sty and Its Assimilation (Tai) Zhu Zhenhong / 190	190
Supplement to Complete of Cishi in the Tang Dynasty Ma Jianhong / 215	215
The Author and the Completing Time of Tang Hui Yao..... Dong Xingyan / 220	220

Analysis the Hu businessmen' s Religious Belief in the Tang Dynasty	Zhao Xihui / 229
Exploring the Taoism Elements in the Central Plain of Shaanxi Province in the Tang Dynasty	Cheng Yi / 236
Cities' Guardian Angels Differences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ang Tao Jia Fayi / 250
The Buddhist Visual Culture in the Two Capitals in Emperor Wu Zetian Period	Yang Xiaojun / 265
Studies on the Laty' s Law of the Buddhist Faith: Based on the Dunhuang Documents	Zhao Qingshan / 281
Children' s Bamboo Hobby Horse Games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Wang Yongping Liu Dongmei / 295
New Data about the Social Life in the Tang Rules Attached to Tian Sheng Rules (Part Two)	Huang Zhengjian / 309
Study on Business Middlemen of the Perfume and Medicine on the Silk Road During the Middle Ages	Wen Cuifang / 320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Grape Fabricated Products from the Turpan' s Documents	Chen Xigang / 331
Sashan silver coin to the East and the East Turkic and other enclosed Ethnic Groups in the Tang Dynasty	Wang Yikang / 375
Whether are there Private Buying System in the Tang Dynasty or not	Xu Dongsheng / 386
Explaining the Chong-fu Style in the Tang Dynasty	Cheng Xilin / 389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Form of Commercial Advertising in the Tang Dynasty	Jin Rongzhou / 395
Geographical Changes on the Center of Paper Making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hen Tao / 403

目 录

唐代后半期的朝贺之礼	(日) 金子修一 小泽勇司 / 1
唐代诸王和公主出阁制度考辨	谢元鲁 / 29
儒家丧服制度对唐代社会的文化整合	赵 澜 / 40
唐代羁縻府州的南北差异	樊文礼 / 48
关于《丧葬令》整理复原的几个问题 ——兼与稻田奈津子商榷	吴丽娱 / 66
试论唐代后期支郡刺史的地位 ——以节度、观察使与支郡刺史的关系为中心	张卫东 / 79
韦君靖碑反映的晚唐地方行政机构与职官	唐志工 / 100
“姑息”与“用兵” ——朝廷藩镇政策的确立及其实施	孟彦弘 / 115
唐后期河北藩镇统治下的世家大族	冯金忠 / 146
安菩墓志铭再考 ——一个胡人家族入居内地的案例分析	李鸿宾 / 160
唐代室韦墓葬和森林草原地带 ——以“角弓”的分析为中心	(日) 内田宏美 / 182
东突厥处罗可汗与颉利可汗家族入唐后的处境及其汉化	(台) 朱振宏 / 190
《唐刺史考全编》拾补	马建红 / 215
《会要》撰者、成书时间考	董兴艳 / 220
唐代胡商宗教信仰探析	赵喜惠 / 229
关中唐代墓葬里的道教因素钩沉	程 义 / 236
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的南北差异	王 涛 贾发义 / 250
武周时期两京地区的佛教视觉文化	杨效俊 / 265
俗众佛教信仰的法则 ——以敦煌写经为考察中心	赵青山 / 281

唐代儿童竹马游戏及其文化内涵	王永平 刘冬梅 / 295
《天圣令》所附唐令中有关社会生活的新资料（下）	黄正建 / 309
中古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香药贸易中介商研究	温翠芳 / 320
吐鲁番文书所见葡萄加工制品考辨	陈习刚 / 331
萨珊银币的东输与唐代突厥等内附诸族	王义康 / 375
唐代是否有买扑制	徐东升 / 386
释唐代《充夫式》	程喜霖 / 389
简论唐代的商业广告形式	金荣洲 / 395
唐宋时期造纸业重心的地理变迁	陈涛 / 403
200 \ 魏丽英	魏丽英
201 \ 浪江波	浪江波
202 \ 工志翰	工志翰
203 \ 魏志孟	魏志孟
204 \ 忠念昌	忠念昌
205 \ 袁国本	袁国本
206 \ 美空田内（日）	美空田内
207 \ 室謙宋（台）	室謙宋
208 \ 程其	程其
209 \ 南兴范	南兴范
210 \ 惠喜斌	惠喜斌
211 \ 义 野	义 野
212 \ 义武 王	义武 王
213 \ 魏家村	魏家村
214 \ 山青村	山青村

唐代后半期的朝贺之礼

金子修一 小泽勇司

一 序

本稿是《唐代长安的朝贺之礼》（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十辑，2009年）（以下称之为“前稿”）的续篇。正如前稿所述，渡边信一郎关注自汉代至唐代的朝贺之礼，特别是正月元日的朝贺之重要性，将其作为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皇帝统治之一端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①。另外，笔者在《则天武后和杜嗣先墓志——与新发现井真成墓志^②有关》（收入王双怀、郭绍林主编《武则天与神都洛阳》，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中指出，叶国良介绍的杜嗣先墓志按时间顺序记录了武周期末期的则天武后的祭祀礼仪，由此弄清了长安二年（702年）正月元日在长安，则天武后举行了朝贺之礼。

以笔者私见，则天武后于长安年间行幸长安一事与立中宗为皇太子有关，并且由渡边信一郎揭示了古代中国王朝举行正月元日的朝贺之礼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说，通过杜嗣先墓志证实则天武后曾在长安举行朝贺之礼这一点对于思考武后政治具有极大的意义。可是如果我们不能把握唐朝整体上举行朝贺的实际状况，便难以理解则天武后在长安举行朝贺之礼一事对于武后而言的特殊性。正巧笔者曾奉职的山梨大学教育系毕业生小泽勇司（现为山梨大学教育系附属小学的教师）著有《唐代朝贺礼仪之特征》（1999年提交）。在笔者的前稿中，征得小泽勇司之允诺，报告了与则天武后也有关系的至睿宗朝为止的朝贺之礼的实际状况。可是在玄宗朝以后，唐代朝贺之事例逐渐增多，通览这些，应可揭示出唐代政治史的另一侧面。因此本报告继前篇论文，借鉴小泽勇司的成果来叙述玄宗朝以后的唐代朝贺之实际状况，同时考察该变迁的意义。在此向小泽勇司深表感谢。唐代实施元日朝贺之事例收录于《册府元龟》卷一〇七、一〇八《帝王部·朝会一、二》（以下简称《册府·朝会》），特别是开元末年以后连续实施。因此在本报告中，主要根据《册府·朝会》，并加上其他史料，编制了“唐代元日朝贺实施表”。请在各处予以参阅。

二 玄宗朝以后的元日朝贺

(一) 玄宗朝

至睿宗朝为止的朝贺记载几乎都是关于特别实施或停止举行之例者。但也有很多记载间接地显示曾举行元日朝贺，或可从中推测曾实施。因此可以认为，关于到睿宗朝为止的唐代前半期，在留至今日的史料中没有记载通常的朝贺。而在则天武后的周王朝，曾于周正的正月（夏正十一月）在洛阳的明堂举行了大享之礼。这是用于替代朝贺之礼的。附属于朝贺之礼的庭实（充庭）之礼也与大享之礼同时举行（参见前稿）。那么如何才能通过史料来证实玄宗朝以后的朝贺之礼呢？

玄宗朝首次见到的元日朝贺是开元四年（716年）之例。在《册府·朝会》中写道：

开元四年正月戊寅朔，帝御正殿^[3]受朝贺。礼毕，亲朝太上皇于西宫。

朝贺之后，朝见了太上皇（准确地说是“太上皇帝”）睿宗。睿宗于该年六月驾崩，在开元五年正月以“太上皇丧制故也”（《册府·朝会》）、在六年正月“以未经大祥”（《旧唐书·玄宗纪》）为由中止了朝贺，睿宗驾崩后两年间，玄宗因服丧而未接受朝贺。不过此间，玄宗从开元五年二月至六年十一月逗留在洛阳，拆毁了则天武后曾使用的明堂，重建了乾元殿^[4]。与此相关，在《旧唐书》卷二二《礼仪志》中写道：

自是驾在东都，常元日、冬至于乾元殿受朝贺。

洛阳行幸中，在元日与冬至在乾元殿实施了朝贺之礼。《资治通鉴》卷二二一将此决定系于开元五年七月条，但由于其后的开元六年停止举行正月朝贺，开元五年十一月冬至的朝贺当然也应停止举行。出现在《旧唐书·礼仪志》二中的上述记载说明了皇帝在洛阳时决定其后在重建的乾元殿举行朝贺这一事实，因此大约它并不说明在开元五至六年曾实施。

玄宗从洛阳回到长安后，开元七年（719年）正月接受了朝贺。《册府·朝会》记述了其于开元十年实施元日朝贺，十二年停止（理由是“万春公主薨”）。关于开元八年^[5]、九年，没有关于朝贺的记载，无法判断是否曾举行朝贺。开元十一年，以及从开元十三年至十五年也不存在朝贺的记载，但玄宗在开元十一年正月巡幸了北都太原^[6]，与开元十三年（725年）十一月冬至在泰山举行的封禅相关，开元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的正月他逗留在洛阳。因而，开元十三年至十五年正月，大约在洛阳的乾元殿举行了元日的朝贺之礼。开元十六年正月，兴庆宫成为朝贺的场所。据《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八《政事·营缮》，“兴庆宫成御朝德音”，兴庆宫正是在该时期落成的，文中还提到“属春令爰始，时惟发生，万方来朝，千官入贺”。即兴庆宫之落成构成了在该处举行朝贺的理由。关于开元十七年至二十

年，十七年正月没有相关记载，而十八年、二十一年则实施了元日朝贺。二〇年正月玄宗逗留在洛阳，朝贺大约也是在洛阳进行的。关于开元十九年正月，在《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中写道：

（开元）十八年遇疾，玄宗每日令中使问疾，并手写药方赐之。十二月薨，时年六十四。上慟恻久之，遂于光顺门举哀，因罢十九年元正朝会。

因张说去世而停止了朝贺。

从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之间，《册府·朝会》记载了二十三年、二十六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的元日朝贺^[7]，场所都在含元殿。可是玄宗从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正月在行幸中，二十三年及二十四年的正月住在洛阳，因此《册府·朝会》的开元二十三年之记载属于错误，应认为该年的元日朝贺是在洛阳宫实施的。关于开元二十二年、二十五年、二十七年，有无元日朝贺不明。顺便指出，关于开元二十二年，在《册府·朝会》中写道：

二十二年闰十一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是日长至，停朝。癸未，御应天楼，受朝贺。

似乎是在该年闰十一月避开冬至之日食，于次日举行了朝贺。可是该年十一月并无闰月，次年二十三年壬午朔的干支也一致。因而上述记载便是记述了开元二十三年进行了冬至次日的朝贺之记载。大约在《册府·朝会》中，在开元二十三年正月的记载之前误置了闰十一月的记载，从而系年也误为二十二年。

天宝年间，每年实施元日朝贺，因此本文仅提及特殊的情况。天宝元年正月兴庆宫的勤政务本楼成为朝贺的场所。天宝六载，其后在太庙与南郊由玄宗进行了亲祭。天宝十载，其后按太清宫—太庙—南郊的顺序玄宗进行了亲祭^[8]。天宝九载正月，玄宗在清华宫接受朝贺，此后，在十一载、十三载，清华宫隔年被用作元日朝贺的场所。关于天宝十二载正月，在《册府·朝会》中没有特别记载，但据日本的正史《续日本纪》天平胜宝六年（754年）正月丙寅条，在天宝十二载的元日朝贺场所发生了日本与新罗的争长事件^[9]。玄宗朝最后的天宝十五载正月的朝贺是在大明宫宣政殿进行的。宣政殿是每月朔望朝会的场所。此时安禄山已经举兵，前一年十二月占领了洛阳。也许受此影响，不是太极殿，而是宣政殿成为元日朝贺的场所。

总结上述内容可知玄宗在位期间的44次正朔中，可证实举行了朝贺的有25例，停止举行者有4例。在没有记载的十五年中，开元十一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四年共六年在洛阳行幸，如前所述，开元二十三年闰十一月举行了冬至朝贺，由此可见，大约在洛阳行幸中也实施了正月朔日的朝贺。剩下的九年（先天二年，开元二年、三年、八年、九年、十七年、二十二年、二十

五年、二十七年)，正月朔日朝贺是否实施不清。

(二) 肃宗朝、代宗朝

肃宗在因安史之乱而动荡不息的至德元载（756年）七月在灵武即位，次年正月在彭原郡接受朝贺（《旧唐书·肃宗纪》）。九月回到长安，次年至德三载（758年）正月在大明宫含元殿实施了元日朝贺。并且在同年六月，朝集使制度一时中止^[10]。次年乾元二年（759年）正月朔日举行了朝贺与受尊号仪式^[11]，乾元三年与上元二年的正月仅实施了元日朝贺。关于前者，在《册府·朝会》里可见到如下内容，它在具体记述了朝贺内容这一点上堪称重要的史料。

（乾元）三年正月癸亥朔，帝御含元殿受朝。中书令代国公子仪（郭子仪）摄太尉上寿称贺。朝退，百僚于宣政殿起居圣皇。乙丑，尝（常）服于崇明门通贺太子。丙寅，外命妇朝皇后于光顺门内殿。

即在含元殿举行朝贺之后，百官在宣政殿起居圣皇（玄宗），翌日百官以常服在崇明门通“贺”皇太子，在其次日，外命妇“朝”皇后^[12]。正如该事例所示，百官向太上皇通起居之例在唐代属于特别的，但向皇后、皇太子朝贺的记载在《册府·朝会》里随处可见。（参见注释^[13]）

其次关于元年建子月，肃宗在上元二年九月壬寅诏中废年号，以该年十一月为岁首，为元年建子月。在《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中写道：

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贺，如正旦仪。

如此，在该月的朔日举行了与元日朝贺同样的礼仪。当然，在次年七六二年正月（元年建寅月）无朝贺。肃宗朝关于元日朝贺值得提及的内容限于上述各点。

关于代宗，在他即位的次年宝应二年（763年）正月无关于朝贺的记载。在该时，代宗尚未将前一年四月相继驾崩的玄宗、肃宗落葬山陵，到三月同时埋葬。在《册府·朝会》中，关于中宗的神龙二年（706年）的元日朝贺写道：

二年正月庚子朔，以则天皇后梓宫在殡，不朝会。

即以则天武后的梓宫尚未葬于山陵（乾陵）为由停止举行朝贺。因此，宝应二年正月大约也是出于同样理由未举行朝贺的。其后的代宗朝实施元日朝贺的例子都出自《册府·朝会》^[14]，其具体情况请参见《唐代元日朝贺实施表》。关于宝应二年以外的无朝贺记载的年份，无法考证是否实施。

(三) 德宗朝

德宗在即位后最初的正月朔日实施了朝贺之礼，改元为建中。不过在《旧唐书·德宗纪》大历十四年十二月条中提到“丙寅晦，日有蚀之。诏元日朝会不得奏祥瑞事”，在此时的元日朝贺中没有奏祥瑞之事。关于其后的建中二年至四年正

月，亦可证实实施了朝贺。

接着在《册府·朝会》中写道：

兴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上在奉天行宫受朝贺。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不是在长安，而是在奉天接受了朝贺。这是由于以卢龙、天雄、成德军的河北三镇为中心的叛乱，长安一时被占领，德宗逃往奉天所致的。此时改元和大赦同时实施了，这与次年贞元元年正月的情况相同。贞元二年与三年正月分别以“岁饥”（《旧唐书·德宗纪》）、“大行皇后在殡”（《册府·朝会》）为由未实施朝贺。贞元四年（788年）与五年都举行了元日朝贺，贞元四年同时进行了大赦，并且，肃宗朝以后中断的朝集使制度在德宗即位后不久的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恢复。可是到了贞元四年正月又被废除^[14]。贞元六年正月，以月食为由停止举行朝贺^[15]。关于贞元七年正月的元日朝贺，在《册府·朝会》中写道：

（贞元）七年正月壬戌朔，帝不视朝。以去年冬亲郊故也。

受前一年贞元六年十一月举行的太清宫—太庙—南郊的系列亲祭之影响未实施。贞元一〇年正月停止的理由也是“以九年冬郊祀故也”，与其相同。这些事例表明玄宗朝末期出现的系列亲祭（参见注释[8]）如在冬至举行，便会发挥出导致翌年正月的朝贺中止的政治性效果。并且，此间的贞元八年、九年的正月朝贺是在含元殿举行的（《册府·朝会》）。

关于贞元十一年至二十一年，贞元十八年正月因“大雨雪”（《册府·朝会》）而中止，此外每年都举行了元日朝贺。关于其中的贞元十三年（797年）与十五年的事例，在《册府》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中有如下记述：

（贞元）十二年十二月，女国汤立志、歌邻国王董利罗、弱水国王董和通、租国王弟邓吉知并大首领等，并赴元正朝会。廻纒并南诏蛮遣使朝贡。

（贞元）十四年十二月，南诏异牟寻遣首望大将毕壬丘各等，朝贺元正，各献方物。

另外关于贞元一九年（803年），在《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中写道：

（贞元）十九年正月旦，上御含元殿受南诏朝贺，以其使杨镆龙武为试太仆少卿，授黎州廓清道蛮首领袭恭化郡王刘志宁试太常卿。

这些都是记述了诸蕃在元日朝贺之际来朝的珍贵史料。我们可以认为，回鹘与南诏等西南夷试图摆脱与吐蕃的关系，增强与唐朝的联系之动向以参列朝贺的形式体现了出来。

在德宗朝，除元日、冬至外，在五月朔日也举行了朝贺礼仪。在《册府·朝会》中写道：

（贞元六年）五月丙寅朔，上御紫宸殿受朝。先是，上以五月一阴生，臣子道长，君父道衰，非善也，父子必以是朔面焉，臣子一例，因令是月朝见。初将冕服御宣政殿。涂潦，乃以尝（常）服御紫宸殿。

贞元六年（790年）首次举行了五月朔日的朝贺。这一年受大雨的影响，祭祀场所设在紫宸殿，通常是在宣政殿举行的。通过《册府·朝会》可证实在其后的贞元七年、八年、十一年、十四年举行了五月朔日的朝贺。贞元十三年、十五年、十六年、二十年未举行，理由较多是因为下雨。不过该五月朔日的朝贺在宪宗元和三年（808年）被废除。在《册府·朝会》中写道：

（元和三年）四月敕，旧制，五月一日宣政殿受朝贺礼，宜停。……

其后（贞元六年以后），每岁率多权停，帝以数术之说经典不载，遂罢之。

其理由是在经典中找不到依据，实际上似乎在此前也多次未举行。大约由于这项礼仪是出于针对蕃镇等欲与皇帝对抗的势力，试图通过增多朝贺的次数来抬高皇帝之权威的这一德宗个人的思虑而举行的^[16]。德宗朝的情况如上。

（四）宪宗朝、穆宗朝、敬宗朝

宪宗是在永贞元年（805年）八月由顺宗禅让而即位的^[17]。次年正月接受了朝贺，在《旧唐书·宪宗纪》中写道：

元和元年春正月丙寅朔，皇帝率群臣于兴庆宫，奉上太上皇尊号曰应乾圣寿太上皇。丁卯，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改元曰元和。

在元日，向太上皇顺宗上奏尊号，朝贺于翌日举行。改元与大赦是随朝贺一起举行的。翌年元和二年（807年）没有关于朝贺的记录，但由于在该年，正月有太清宫（一日）—太庙（二日）—南郊（三日）系列亲祭，元日举行了太清宫的祭祀，因此当天大约未举行朝贺。关于元和三年的朝贺，在《册府·朝会》中写道“以将受尊号”，因受尊号仪的影响而未举行。从元和四年到十年，除元和七年外所有的年份都举行了元日朝贺。关于元和七年正月停止朝贺的理由，在《册府·朝会》中写道“以皇太子薨废朝”，即是由于前一年十二月惠昭太子去世。

从元和十一年至十五年，除了在元和十三年（818年）正月朔日举行了朝贺与大赦外，其他年份的朝贺都未举行。元和十一年、十二年、十四年未举行朝贺是出于同样理由。据《册府·朝会》，十一年正月的朝贺因前一年十二月的敕而中止。该敕与《唐大诏令集》卷八〇《淮西用兵罢元会敕》相同，其理由是正在用兵之

中。关于元和十二年、十四年未举行的理由，在《册府·朝会》中分别写为“以淮右宿兵”、“以东讨淄青李师道未班师”，由于被派遣去讨伐藩镇的军队未回归长安而宿兵，故取消了元日朝贺。关于最后的元和一五年正月，在《旧唐书·宪宗纪》中写道：

（元和）十五年春正月甲戌朔，上以饵金丹小不豫，罢元会。

由于宪宗不豫而停止朝贺。关于宪宗朝的情况如上。

关于穆宗朝，在《资治通鉴》卷二四三中可见到下述内容。

（长庆）四年春正月辛亥朝，上始御含元殿朝会。

即长庆四年（824年）正月举行的朝贺对穆宗而言是最初一次朝贺。这样来看，从长庆元年至三年未举行元日朝贺。其中长庆二年与长庆三年的元日朝贺分别“以用兵”、“以疾”（皆出自《旧唐书·穆宗纪》）的理由而停止举行。关于长庆元年，未见有关元日朝贺的记载。大约是受同一月进行的系列亲祭（二日至四日）的影响而未举行的。

关于敬宗朝，可以证实宝历元年（825年）正月停止举行元日朝贺、二年正月实施。宝历元年停止举行的理由未写明，但可推测与穆宗长庆元年时的情况相同，与即位次年正月的系列亲祭（宝历元年正月五日至七日）有关。

（五）文宗朝、武宗朝

关于从文宗的宝历三年（827年）到大和四年（830年），可以证实大和二年与四年未举行元日朝贺，但其理由不清。宝历三年、大和三年没有关于朝贺的记载。关于其中的宝历三年，未进行德宗朝以后成为惯例的即位次年正月的系列亲祭，改元也推延到次月。这大约是由于起初预定举行系列亲祭而不举行朝贺，可是缘于某种原因，系列亲祭延期了^[18]。大和五年、六年未进行正月朝贺。在《册府·朝会》中分别写道“阴雨连旬”、“阴雨未晴”，可见停止举行的理由都在于天气不佳。关于其后的大和七年（833年），在《旧唐书·文宗纪》中写道：

（大和）七年春正月乙丑朔，御含元殿受朝贺。比年以用兵、雨雪，不行元会之仪。

至该年为止不太举行元日朝贺。停止举行的理由是“用兵、雨雪”，但在上述事例中，在大和七年以前的文宗朝没有一例是由于“用兵”。未写明停止理由的大和二年、四年，以及没有记载的宝历三年、大和三年大约是因“用兵”而停止正月朝贺的（参见注释[18]）。可证实确是因用兵讨伐藩镇而停止朝贺的最初事例是宪宗的元和十二年（816年），作为唐代后半期的倾向值得注意。

没有记载表明大和八年举行了元旦朝贺。《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大和七年十二月庚子》条中写道“上始得风疾，不能言”。文宗此时苦于中风。并且在该书卷三四五中写道：

大和八年春正月，上疾小瘳。丁巳，御太和殿见近臣，然神识耗减，不能复故。

由于文宗病情略有好转，故在丁巳五日接见了近臣。以文宗的状况来说，在大和八年（834年）正月大约是无法接受朝贺的。可知翌年九年正月停止了朝贺，未写明其理由。

关于开成元年（836年）的元旦朝贺，在《旧唐书·文宗纪》中写道：

开成元年正月辛丑朔，帝常服御宣政殿受贺。遂宣召大赦天下，改元开成。

在宣政殿受贺之同时进行了大赦改元。开成二年、三年正月未举行元旦朝贺，其理由未写明。关于开成四年无记载，不知有无朝贺。在前一年一〇月庚子，太子永去世，或许是因此而未举行四年正月的朝贺。开成五年正月，以“上不康”（《旧唐书·文宗纪》）为由而停止举行朝贺。文宗朝的情况如上^[19]。

在武宗朝有涉及朝贺之记载的是会昌三年、四年、六年三例。三年与四年分别以“宿师于野”、“以泽路用兵”（《旧唐书·武宗纪》）为由停止了元旦朝贺。关于会昌六年的元旦朝贺，在《资治通鉴》卷二四八中写道：

（会昌五年十二月）上自秋冬以来，觉有疾……诏，罢来年正旦朝会。

因武宗之病而停止了朝贺。在没有记载的会昌元年、二年、五年三个事例中，会昌元年与五年的正月举行了系列亲祭，或许是受到其影响而停止了朝贺。那样的话，就是说武宗在位期间基本上未举行正月元日的朝贺。

（六）宣宗朝以后

宣宗朝以后，有关朝贺的记载急剧减少。关于各位皇帝，没有记载的年份很多，元旦朝贺的情形相当模糊。因此本节仅以有记载的年份为主来叙述。

宣宗朝，关于大中八年正月的元旦朝贺，在《资治通鉴》卷二四九中有如下记载：

（大中七年）冬十二月，左辅阙赵璘请罢来年元会，止御宣政。上以问宰相，对曰，元会大礼，不可罢，况天下无事。上曰，近华州奏有贼光火劫下邳，关中少雪，皆朕之忧，何谓无事。虽宣政亦不可御也。

据此可知，左辅阙赵璘要求停办大中八年（854年）的元旦朝贺，但宰相会议上决定应该进行大礼朝贺。可是最后依照宣宗之意决定停止举行元旦朝贺^[20]。因

此可以推测不同于武宗朝，在宣宗朝，此前实施了元日朝贺。

在记录了宣宗一代见闻的昭宗朝（888~904年）的裴庭裕《东观奏记》中也可见到不同于上述事例的别的元日朝贺的例子。在该书卷下如下写道：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师卢钧，年八十矣。自乐悬之南，步而及殿墀，称贺上前。声容朗缓，举朝服之。至十二年元日，含元受贺，太子少师柳公权，年亦八十矣，复为百官首。含元殿廷曷远，自乐悬南，步至殿下。力已绵惫，称贺之后，上尊号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权误曰光武和孝。御史弹出之，罚一季俸料。七十致仕，旧典也。公权不能克遵典礼，老而受辱，人多惜之。

即其中记录了在元日朝贺时卢钧之矍铄与柳公权之失态两段插曲，可以证实大中十一年（857年）、十二年连续举行了元日朝贺^[21]。或许可以说宣宗朝是至唐末为止较多实施元日朝贺的时代。

在其次的懿宗朝，能见到有关朝贺之记载的是咸通五年、七年、十年，都未举行元日朝贺。咸通五年（864年）正月“以用兵”（《旧唐书·懿宗纪》）为由而停止举行。咸通七年与十年停止举行的理由分别是“太皇太后丧”、“以徐泗用兵”（皆出于《册府·朝会》）。无记载的年份有无朝贺不清，但懿宗朝发生了裘甫之乱和庞勋之乱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大约难以举行朝贺。接着在僖宗朝不见有关朝贺的记载，这或许也跟因黄巢之乱，僖宗在成都蒙尘这一状况有关。

在昭宗朝，龙纪元年（889年）、大顺元年（890年）、景福元年（892年）、乾宁元年（894年）的正月朔日分别进行了朝贺，同时也进行了改元、大赦（《旧唐书·昭宗纪》）。这些朝贺的场所都在太极宫武德殿。关于其后的乾宁四年，在《旧唐书·昭宗纪》中写道：

四年春正月丁丑朔，车驾在华州行宫，受群臣朝贺。

昭宗在华州的行宫中接受了朝贺。另外关于光化四年（901年）也在该书该纪中写道：

春正月甲申朔，昭宗反正，登长乐门楼，受朝贺。

可以证实太极宫长乐门楼举行了元日朝贺。这样在昭宗朝初期频繁改元，与此相随举行了朝贺。另外在武德殿、长乐门楼等太极宫内实施也可谓昭宗朝的朝贺之特征。

据古濂奈津子认为，皇帝在大明宫居住、执行公务、举行公共礼仪等是始自玄宗朝后半期^[22]。正如本报告及附表《唐代元日朝贺实施表》所揭示的，开元七年（719年）以后，朝贺的场所基本上在大明宫含元殿。另外，居住在太极宫的睿

宗在景云三年（712年）正月在太极殿接受了朝贺，在玄宗朝也于太上皇帝睿宗在世时（开元四年六月驾崩）在太极殿举行了朝贺。时隔多年，昭宗朝再次在武德殿等太极宫中举行朝贺，一般认为此时大明宫被弃用^[23]。通过上述内容可以说，在唐代朝贺礼仪是以皇帝居住的空间为场所举行的。而关于唐代的即位礼仪，在唐后半期，宣布皇太子即位的宣遗诏改为在皇帝居住的大明宫中进行，以授受册书为中心的即位典礼本身在太极殿上举行^[24]。在考虑唐代的太极宫与大明宫的关系、朝贺礼仪与即位礼仪的作用之不同上，这些点都是值得留意的事实。不过，还应注意昭宗的朝贺未使用唐朝本来的正殿太极殿。

并且关于取代被朱全忠绑架到洛阳，在那里被杀害的昭宗，而被立为皇帝的哀宗（昭宣帝），完全不存在有关朝贺的记录。

三 唐朝的冬至朝贺

（一）《大唐开元礼》中的冬至朝贺礼仪

在唐代，朝贺礼仪不仅在正月朔日，还在冬至举行。本章首先将《大唐开元礼》卷九七《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贺》（以下简称《开元礼》卷九七）的冬至朝贺礼仪之特征与元日的礼仪进行比较来弄清，接着探讨在唐代实施的情况。

《开元礼》卷九七中的元日朝贺礼仪的程序如下，可以礼仪为中心将其整理如下。

a 朝贺

- ①皇帝出御（服衮冕）
- ②朝贺礼仪
- ③由中书令上奏诸州镇上表文
- ④由黄门侍郎上奏祥瑞
- ⑤由户部尚书上奏诸州贡物
- ⑥由礼部尚书上奏诸蕃贡物

b 会

- ①皇帝出御（服通天冠）
- ②上寿礼
- ③行酒礼
- ④羞饭、赐酒

a 朝贺	b 会
① 朝贺礼仪	① 上寿礼
② 上奏诸州镇上表文	② 行酒礼
③ 上奏祥瑞	③ 羞饭、赐酒
④ 上奏诸州、诸蕃贡物	